

食品危机背景下菜农的风险结构 及风险分配机制分析

——基于鲁南 S 村的微观观察

杨瑞玲, 左 停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摘 要 频频出现的蔬菜质量危机和菜贱伤农事件, 反映出菜农面临的风险相比一般农户更加复杂。通过对鲁南 S 村菜农微观风险世界的观察, 结果发现: 菜农完全嵌入市场体系, 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共同构成其风险结构, 菜农对自然风险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 市场风险更易造成实质性损失, 技术风险尽管具有潜在性却隐含巨大的社会爆炸力。菜农对以自然风险为代表的传统风险较敏感, 对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等现代风险感知滞后, 且存在认知偏差; 风险认知偏差、现代劳动分工、二元市场结构以及正规避险机制缺乏, 将菜农锁入现代风险并使其处于高风险的地位。基于此, 提出降低菜农风险的建议: 对菜农进行职业教育和能力培养; 加强对农村妇女和老人的服务; 规范农村市场秩序, 健全国内农产品市场, 支持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 构建正规安全网等。

关键词 菜农; 风险; 风险地位; 市场; 食品危机

中图分类号: F 32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5)01-0054-07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15.01.008

风险社会不再只是个认知概念, 而正成为一种秩序和公共空间^[1], 这一预言在近几年的食品行业已经应验。从 2010 年初海南毒豇豆事件到“蒜你狠”“姜你军”, 再到 2013 年的毒姜事件, 屡屡发生的蔬菜质量安全事件和菜价轮番上涨使蔬菜成为城里人餐桌上的热门话题, 与此同时餐桌另一端成千上万菜农又时时被菜贱所伤, 2011 年以来的“辛卯菜农之殇”、菜农自杀、市长卖菜、免费送菜等热点事件都折射出菜农之痛。一方面, 尽管菜农面临的风险相比一般农户更加复杂, 现有的研究仍主要针对对常规农户或是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农户的风险^[2-6], 而对菜农这样的商品化农户风险还研究较少。另一方面, 就食品危机而言, 国内外理论上的共识是由末端控制转向过程控制^[7-8], 国内目前的研究较多是从法律、制度、市场机制、公众风险认知等角度出发的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展开的宏观研究^[9], 或是从生产环境、生产行为、组织方式、市场渠道、价格和质量指标、消费者认知和购买行为等产业链方面来探究蔬菜价格及质量安全问题^[10-13]。尽管作为风险源头和风险主要承担者的菜农已经深深卷入了风险

情境中, 但目前对于菜农风险的微观研究还非常缺乏, 探索菜农的风险世界, 对于理解菜农的风险境遇、改善菜农生产决策、促进蔬菜产业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菜农的风险及其特征

1. 菜农: “双脚都站在市场经济中”

S 村是山东平原地区一个中等规模村庄, 距离 T 市 10 km, 交通便捷。以小农户为生产经营单位, 以家庭劳动力和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 是当地农民普遍的经营方式; 人均约有 400 m² 耕地, 土地分割细碎、人口稠密、耕地稀缺是当地典型的农业资源特征。在集体化时期曾创过全国小麦高产纪录的 S 村村民在农村改革以后由粮农变为菜农, 日益卷入国内大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体系中。20 世纪 90 年代起村民逐渐不种粮、不存粮, 日常饮食消费全部依赖市场购买。蔬菜种植、务工和经商构成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村民相对富裕, 2011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8 884 元, 而同期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8 342

元,全国平均水平为 6 977 元。蔬菜生产者以妇女和老人为主,但蔬菜是具有季节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绝大部分农户在农忙季节会出现劳动力不足,只能依靠在外季节性务工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回家帮工、或亲友帮忙、或从劳务市场雇工,而在短暂农闲时妇女和老年农业劳动力也到本地劳务市场或工厂打零工。尽管仍是小农户经营,但与传统农民相比,菜农呈现出商品化程度高、职业化程度高、商品意识和时间观念强、生产要素投入密集度高等特征。

菜农的现金收入和购买力都依赖于市场价格体系,已经不再是艾利思定义的“主要从农业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劳动……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和产出市场”^[14],也不再是陈传波等界定的“基本以家庭内劳动力来从事生产,直接依赖于农业产出维持生存需要,生产率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缺乏现代农业生产机制,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的小农户”风险主体^[5],反而像斯科特所描述的“双脚都站在市场经济中”^[15]。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16],具有强烈的时空压缩性,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以及本土与全球因素交织在一起^[17],这种压缩的冲突与碰撞在农村体现很分明。农民被卷入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洪流,其生产、消费、生活方式都面临着巨大变革,与常规农户相比,菜农面临传统与现代风险的双重冲击。

2. 菜农的风险结构及特征

在菜农遭遇的风险中,自然风险是基础性风险,菜农对其有较强的应对能力,市场风险更易造成实质性损失,技术风险尽管具有潜在性却隐含着巨大的社会爆炸力。

(1)自然风险:适应和应对。自然风险是基础性风险,包括气象灾害、病虫害、气候异常等,菜农适应自然风险并有应对能力。

自然风险首先表现在气象灾害。大风、大雪、暴风雨、冰雹、涝灾等气象灾害是 S 村菜农最常遇到的风险。其次,气候因素还诱发病虫害。村民近年来常遇到的玉米粗缩病、土豆疫病、姜瘟病病害的发生都与气候有关。再次,自然风险还表现在因气候反常而导致农民难以掌握“不违农时”的规律。老人们认为现在气候比以前偏暖,“小时候那会儿比现在冷,那会儿冬天冰冻 20 公分,现在只冻 5 公分”,附近小麦种植区的农民按照往常节气播种,因秋季气温偏高小麦拔节尺余只好毁了重新种,而对于菜农

来说,秋季气温偏高会导致土豆晚疫病多发,但秋季多雨、气温偏凉又会导致土豆腐烂或者生长缓慢,到霜降收获时长不大。

为了应对自然风险,菜农种植前通过收看天气预报、多样化种植和增加投入来预防风险,种植后则通过人力和田间管理技术来减轻灾害影响。菜农养成每天看天气预报的习惯,既为防灾,也为安排打药、灌溉等田间管理活动。尽管每户只有一两亩土地,但每年种植超过 5 种作物,一个家庭通常同时采取两种耕作制度:一是春季种植(大棚、地膜)土豆,夏季种植玉米、毛豆或少量大豆,秋季种植土豆或绿萝卜的一年三熟制;二是春季种植(大棚、地膜)土豆,夏秋季节种植大葱或姜的一年两熟制。一些农户在连续几年因玉米粗缩病减产,减少玉米面积改种或套种豆类,以实现风险分散。姜的经济效益高,但栽培较精细,易生病,农户夏季种姜时还会种植其他作物以避免风险。在风险应对能力上,菜农遵循“高投入、高产出”的逻辑,由露地、地膜到温室大棚,由小棚到竹架到金属架,水、肥、农药、种子等,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密集化的投入是农民应对自然风险、提高产量的普遍做法。种植后,菜农主要依靠人力和田间管理技术来消除灾害影响,如风雨过后去扶被刮歪的玉米秆、修补大棚,及时刮去大棚上的积雪、排水、施药、补种等。总的来说,菜农呈现出内向型的“自我保险”策略,主要依赖于家庭内部资源来应对,难以获得正规风险应对机制的支持。

(2)市场风险:实质性影响。传统社会中市场风险未被问题化,市场风险是现代市场的内在特征,是在市场作为社会制度的现代性变迁中被问题化的^[18]。大市场的波动既为菜农带来机遇也带来风险,市场风险难以预测,菜农应对自然风险虽然积攒了一些经验,但对市场风险则几乎没有有效手段,因而市场风险最可能对菜农生计造成实质性影响。

市场风险直接表现为价格波动,包括农产品价格波动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压力,抵消了税费减免带来的实惠,不过对于菜农影响更显著的是农产品市场风险。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既有长期的年际波动,也有短期的即时波动。蔬菜收获季节,前期和后期收购有价差,同一天之内也有价差,甚至一日几连跌。2009 年黄姜收获季节曾贵到 10 元多,但妇女 B 在 3.50 元的时候就卖了,她说“农村就是逮不着,逮不着东西,也逮不着价格,有可能上来贵、后来便宜,有可能上来

便宜、后来贵”。一位经纪人的 2009 年秋季土豆收购记录显示:记录的 38 天中,有 9 天出现过 2 个价格,1 天出现过 3 个价格,3 天出现过 4 个价格,波动最严重的一天出现了 5 个价格。菜农早上问到的是一个价,往往下午去卖菜时又是另外一个价。价格风险具有乘数效应,使菜农收益打折或翻倍,对完全嵌入在市场经济中的菜农生计造成实质性影响。

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和广泛。即使在村庄层面,菜农也面临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市场因素影响,诸如贸易壁垒、外界资本市场、行业间比较利润率、食品安全事故、气候变化、气象灾害、特殊事件等因素都嵌入到蔬菜价格的生成机制。S 村的脱水蔬菜厂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等地,2006 年日本出台的肯定列表制度、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都严重打击了该厂蔬菜加工品的出口,只好由出口转为低价内销。此外,房地产及相关产业链较高的行业利润率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并推动人力价格上涨,该厂无力承担越来越高的人力成本,目前只能缩短生产时间,季节性地招聘老年人和妇女工人,长期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则难以引进。即便是个体菜农,也逐渐感知到市场的链式反应。2010 年春季当地土豆主要销往上海,菜农明显感觉到当年土豆收购价受上海世博会拉高。妇女 R 平时通过看新闻来了解农产品行情,2010 年秋季韩国发生泡菜危机拉高潍坊的大白菜价格,她根据这一事件推测到当年秋冬季菜价总体不会低。2011 年春季由于气温比往年同期偏低、季节优势消失导致当地春季土豆收购价下跌将近 1 元,这一年春季菜价普遍下跌,发生了济南菜农自杀事件。

(3)技术风险:社会爆炸力。技术风险表现在技术采用失败和技术滥用两方面,后者尽管具有潜在性却隐含巨大的社会爆炸力。

得益于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菜农收益得以提高,但其采用新型农业技术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农业女性化和老龄化的日趋普遍,采用技术失败会造成损失,如农民购买了劣质毛豆种致减产、因施肥施粪失误导致作物烧死减产。技术风险还表现在技术滥用。技术滥用使农民自身成为潜在的公共风险来源,并具有贝克所说的“飞来去器”效应^[19],最终可能打击到自身。菜农施药时往往加大剂量和施用频次,直接用手搅拌药水,缺乏安全意识,随意丢弃废弃物,在地埂和道路两旁丢弃的农药包装瓶、袋随处可见。实地调研中就遇到一位农药中毒的妇

女仍照常劳动,村民言谈之间对农药中毒这样的事情并不重视。农民生活的医学化,意味着现代风险和对风险的防范意识、手段直接进入了农民的生活^[20],在生产方面同样存在这种医学化的倾向,但当技术被滥用时,就变成了新的风险来源,这些行为威胁农民自身的健康、经济利益和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毒豇豆、毒姜等事件的起因就是菜农滥用农药,这样的事故最终引发食品安全危机、消费者愤怒、市场封杀^[21],巨大的社会爆炸力不仅使产地菜农受到市场惩罚,还连累其他菜农,农药滥用则污染本地地下水从而威胁到菜农自身的安全,但菜农由于信息滞后、观念陈旧和侥幸心理,对于技术风险极为不重视。

二、菜农的风险认知

尽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共同构成菜农的客观风险世界,他们对于风险的主观认知仍主要集中在生产风险尤其是自然风险,菜农的风险意识相较于其风险实践偏于传统,对现代风险缺乏敏感。

1. 认知序列:自然风险为基础

关于“风险”,由于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取向的差异并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定义。研究农户风险的学者倾向于将风险与收入支出的增减挂钩,或者认为“风险”一词对农民来说过于专业而在调研和分析中使用一些替代性的表述,如“大的经济困难和开支”“担心的事或问题”^[5,22]。

菜农对于风险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以日常化的语言来界定风险,在其眼中风险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难以抗拒性。“风险就是没有计划,意料之外的事”“干什么都有风险”“老天爷定的,不是哪个人能定的”“农民就怕风险,人们抗不了”,这样的描述,反映出农民的风险抵抗能力和手段都欠缺,有无奈感。除上述抽象描述外,大多数人直接举例说明(见表 1)。

风险除其客观层面之外,还表现在主观层面,除了物质上的损失外还造成心理困扰。菜农在解释风险时使用大量心理词汇,如“担心”“害怕”“意外”“无所谓”“大马虎”。在风险事件描述时,妇女比男性反映更强烈,使用了大量心理词汇,如“心理折磨”“害怕”“七上八下”“对于未来很不确定”“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把人累得在地里哭爹喊妈,刮大风了,妇女心里害怕,担心,骂老天爷,想让庄稼长得好好的”,

表 1 菜农列举风险归类

序列 1	序列 2	序列 3
		天灾(风雪雨雹洪涝病害)(12)
		投入大、农资贵(2)
	农业风险(损害农作物、收成减少或绝收;影响收入、怕亏损)(6)	价格风险(1)
		种子质量(1)
		农药残留(1)
		虫灾(1)
		缺乏创新、新技术采用滞后(1)
出事、天灾人祸(2)	投资风险(做生意、投资)(3)	
	务工风险(工资拖欠、工伤)(3)	
	健康风险(病情)(2)	
	贫困(吃不上喝不上、没钱)(2)	
	村庄治理(村干部)(2)	
	风暴雨房子倒塌(1)	
	子女教育(怕子女上不成学)(1)	
	丧失劳力(包括年老)(1)	

注:“()”内数字为菜农提到的频次。

看天气预报有大风、大雪、沙尘暴“心惊肉跳”,冬天晚上刮大风想着地里的大棚“不敢睡觉”,大棚被刮坏了“失落,失望,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累坏了”。自然风险尤其是气象灾害是菜农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而妇女作为主要农业劳动力,其心理压力更显著。

如徐慧清等的判断,“生产风险意识尤其是其中的自然风险是农民风险意识的基础组成部分”^[23],菜农对于风险的主观认知也主要集中在生产风险尤其是自然风险。

2. 市场风险:近因效应与乐观偏差

菜农对于市场风险的认知具有近因效应和乐观偏差的特征。由于较强的自然风险应对能力,菜农可以较准确预测和保障蔬菜产量,但对于蔬菜市场价格却捉摸不定。菜农往往依据过去一两年的市场行情来预测且存在乐观倾向,既往的失败经历很少被拿来作为教训。20 世纪 90 年代初 S 村曾大面积种植大蒜,后由于大蒜价格从 0.70 元/kg 暴跌至 0.02 元/kg,损失惨重,于是大蒜绝迹,但这一事件并没有使村民对价格风险敏感起来。近几年土豆价格并不稳定,2007 年徘徊在 0.60 元/kg 到 1.00 元多/kg,2010 年由于上海世博会的契机达到最高价 2.4 元/kg,在菜农因韩国泡菜危机而对菜价持乐观态度半年之后的 2011 年春季,圆白菜价格大跌成为压垮济南菜农韩进的最后一根稻草^[24]之时,土豆价格又跌回到了 1.40 元/kg。目前除农民企业家和合作社社长、村干部等少数精英认为蔬菜存在价格风险

外,绝大多数菜农抱有乐观情绪,意识不到价格风险。

农产品价格的蛛网现象往往被归咎为农民的“短视”“一哄而上”“跟风”,包括村干部、农民企业家和经营业主等村庄内的精英也持类似态度,他们认为农民没有什么市场风险意识。然而,农产品价格预测需要长期的观测数据和专业的统计分析,个体农民确实无法精确预测市场,乐观估计是菜农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现实策略,偶尔有些能人凭借自己聪明头脑“瞅准时机”反向生产获得较大利润,但这类案例大多具有投机性,难以根本解决问题。农产品价格风险的最终解决还应借助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来专门预测和统筹。

3. 技术风险:知识体系的断裂

菜农的风险意识还处于由传统风险意识向反思性现代风险意识过渡的阶段,依靠经验性知识可应对传统的自然风险,而以技术、市场风险为代表的现代风险往往超越了菜农的直观感知和经验,其对此类风险的感知具有迟滞性和模糊性。科技成为现代风险的制造者、诊断者和治疗者,菜农的经验性知识体系与现代科技知识体系之间的断裂使他们面临较高的风险。

(1)菜农的经验知识体系与专家知识体系之间存在断裂。以玉米粗缩病为例,S 村连续几年玉米粗缩病致大面积减产乃至绝收,农民观其症状形象地称该病为“小老头棵”,围绕致病原因相互讨论和交流,归咎于假劣种子、假劣化肥、假劣农药、土壤等可能的原因。随后当地媒体、政府和推广部门等不同渠道传达了专家解释:玉米粗缩病是由害虫灰飞虱在吸食玉米叶片的汁液时将病毒注入植株感染所致,近几年因为气候的变化,灰飞虱有逐年加重的趋势。农民对这一信息的接收和理解大打折扣,一些村民依然将信将疑,坚持自己之前的猜测,不认同专家话语。很少有人能记住这个病的名字,少数佼佼者往往也只能记住几个关键词“粗缩病”“灰飞虱”,几乎没有村民能准确说出其致病原理。一位种地经验丰富的老农在解释致病机理时借助了自己的想象力:玉米苗小的时候,灰飞虱把玉米苗嫩芽的汁水吸走了,所以玉米长得畸形,结不了玉米。

现代风险有的只在微观层面使用专业工具才能观察到,使用专业知识才能解释清楚。专家对于风险的识别、检测、解释和规避有一套科学技术话语体系。在风险沟通过程中,作为风险解码者,科学知识代表的专家系统成为话语的权威掌控者,作为风险

解说者,控制传播渠道的公共传媒,成为话语的媒介代理人^[25]。菜农的经验具有本土化的优势,但积累速度赶不上现实变化速度,乡土知识和经验对于许多现代风险缺乏解释力和认知能力,而两种知识体系之间的断裂和有效传播渠道的缺乏又阻碍了菜农对于科学话语体系知识的吸收,降低风险沟通的效果。当菜农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时,依然是从传统的经验之箱中提取应对现代风险的心理与现实策略^[26],当经验不足时只能依靠想象和猜测来嫁接两套知识体系之间的鸿沟。

(2)菜农与“庄稼医生”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既依赖于“庄稼医生”又需要防范道德风险。在官方农技推广体系悬浮于基层农民需求之外的现状下,农资企业及其销售网点代理人承担着大部分农技推广职能。在S村,菜农接受的培训和技术支持主要来源于农资公司的促销式培训和农资销售人员。农资销售人员在日常生产中承担了“庄稼医生”的职能,提供“处方式治疗”服务。他们根据菜农对症状的描述开农药和肥料,嘱咐用量、兑水比例、施用方法,简单介绍其功能。菜农对农药、化肥的知识欠缺,对农药名称、毒性、防治对象和正常使用剂量、施药操作方法、中毒症状和急救常识、废弃物的处理和相关政策法规都不是很了解,而是依赖“庄稼医生”的处方和自己的感觉、经验。一位“庄稼医生”报道自己的诊断经历时谈到“一般我问他什么毛病,就给他什么药,也有些人掌握什么病,用哪种药。买农药的,女的占七成,一般都是结过婚的,中年妇女比较多,也有五六十岁的;男的很少,男的都是老年人。买肥料的,男的多,用车驮。”应对知识鸿沟和道德风险,菜农有自己的“保险策略”,如与他人交流、试验、加大用量或者同时从几家购买。老年妇女不识字怕受骗,往往是老头子替老太太买或趁其他顾客也在场时买,但加大用量会导致农药残留,老头子替老太太买药,这样也会导致买药者、施药者错位,从而降低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与沟通效果,甚至信息失真,这些都有可能酿造新的风险。

(3)相对于日益重视食品质量的消费者,菜农在食品安全、自我防护 and 环境保护方面意识不强。近年来诸如“三聚氰胺”“毒豇豆”“毒姜”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使得消费者对食品质量日益重视,而菜农的食品安全意识却不足。大部分菜农确实在地头或路边有“自留菜地”,但动机主要是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

源,访谈的57个案例中仅有两例是因为吃放心菜而留下自留菜地并很少施药,一位是村庄的脱水蔬菜厂经营者,另一位兼职村里的妇科医生,可见有食品安全意识的还仅是少数精英。菜农食品安全意识欠缺与消费者对蔬菜质量的日益重视这一组矛盾酝酿了食品安全风险并具有社会爆炸力。

三、菜农的风险地位

贝克用“风险地位”这一概念来描述风险在人群中的分配,在其理论中,一方面现代风险具有知识依赖性,知识决定风险地位,风险的感知本身就产生风险;另一方面尽管现代风险具有全球性和“飞越去器效应”,也会依赖阶层、阶级和国际地位而分配^[19],可见,风险认知和社会结构都会影响风险地位。

1. 风险认知偏差:产业链中的风险承担者

在现代社会,菜农的风险环境中纳入了更多新的因素,包括气候变化、贸易壁垒、资本市场、食品安全事件、特殊事件等因素都嵌入了个体农户的生产实践和蔬菜价格的生成机制,影响因素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然而,菜农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生产风险尤其是自然风险对现代风险缺乏敏感。相对应的菜农在蔬菜产业链中成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是最弱势的一环,当风险暴发,大部分风险只能由菜农个体承担。菜农在产业链中低微的分利与其风险承担程度不相匹配。

2. 风险群体分配:女性化和老龄化

在一些地区,蔬菜生产决策都由男性户主掌握,男性在安全蔬菜供给决策中起决定作用^[27],而笔者在S村调研发现截然相反。在这里,蔬菜生产主要由妇女和老人承担,他们成为风险的直接承担者。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在采用新技术过程中最吃力,更可能遭受技术失败带来的损失。中年妇女往往比老年人受教育多、体力好,相对容易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成为技术扩散的最先采用者。她们养成看天气预报和农科节目的习惯,注重农业知识的学习,对蔬菜的疾病诊断、农药化肥的使用比老年人懂得多,老年女性往往需要向中年妇女学习和交流。如前文所述,风险除物质上的损失外还造成心理困扰,大量具体形象的心理描述反映了女性比男性反映更强烈,既与性别特点有关,也与农业生产的女性化有关,妇女承担了主要的农业负担。

3. 风险放大器:二元市场结构

菜农“双脚都站在市场经济中”,国内城乡之间、

国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存在的二元市场结构,放大了菜农的风险。

城乡二元市场结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秩序规范程度的差异,强化了菜农的高风险地位。一些商贩利用城乡之间的信息差和农民知识的不足,流窜乡村设骗局,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农村,欺骗性市场行为比较猖獗。S 村曾发生过几起这样的骗局,加剧了农民与外界的芥蒂和隔阂,也破坏村庄社会的基本信任感。一些农资推销团队,请“教授”“大学生”,借着技术指导和培训的名义推销产品,农民难以辨别真假。农村市场还存在不正当竞争甚至以武力欺行霸市的行为,也制约了菜农利益的实现,例如 S 村所在乡镇范围内生姜收购都被一人垄断,外来商贩来收购生姜会遭受暴力威胁。

加入 WTO 和贸易全球化后菜农面对来自国际上的竞争者。如前文提到的韩国泡菜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汇率、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等国际因素也成为村庄个体菜农风险的影响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一方面,我国菜农组织化程度低,信息缺乏,种子和农药技术越来越依赖进口,另一方面,我国农业正规风险规避机制缺乏、产品质量缺乏监管、食品安全机制不健全。农业市场在国家间的二元机制,削弱菜农的竞争力。

4. 风险责任个体化:正规避险机制缺失

正规避险机制缺乏导致菜农风险责任被个体化,恶化了我国菜农的不利地位。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农业合约、保险及衍生品市场发育较充分,提供了各种农业风险管理工具^[28]。在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瘫痪、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停滞、政策性农业保险长期缺位、商业农业保险羸弱、金融借贷存在障碍,正规风险规避机制总体上缺失。菜农的风险损失和责任都被“个体化”,被认为是农民个体的事情由他们自己承担,主要依靠家庭及其社会网络来抵御风险,采用所谓的内向型“自我保险”策略^[29],技术服务主要从市场获取,如农资公司和农业企业。这与农业具有的公共属性不相匹配。近两年订单农业有小规模发展,但整体而言,农业保险,农业合约、小额金融、商业保险还未发育,没有发挥到应有作用,更没有可依靠的衍生品市场。

四、结 语

尽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共同构成菜农的客观风险世界,但他们对于风险的主观认知集

中在生产风险尤其是自然风险,菜农的风险意识偏重于传统风险,对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等现代风险缺乏敏感意识。风险认知偏差、现代劳动分工、二元市场结构以及正规避险机制缺乏,将菜农锁入现代风险并使其处于高风险的地位。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女性化以及离村居民城市化,我国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培育有知识、懂技术、抗风险的新型农民既是发展所需,也是改善农民生计的内在要求。要改善菜农的风险地位,应致力于弥合知识体系之间的断裂,对菜农进行职业教育和能力建设;加强对农村妇女和老人的支持和服务;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健全国内农产品市场,支持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构建正规安全网。

参 考 文 献

- [1] 杨雪冬. 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4): 61-77.
- [2] 杨龙,汪三贵,支婷婷,等. 贫困地区农户的波动性风险和脆弱性分解——基于四省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J]. 贵州社会科学, 2013(07): 107-114.
- [3] 谢治菊. 西部地区农民对农村社会的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4): 12-21.
- [4] 陈传波. 农户风险与脆弱性: 一个分析框架及贫困地区的经验[J]. 农业经济问题, 2005(8): 47-50.
- [5] 陈传波,丁士军. 中国小农户的风险及风险管理研究[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25-70.
- [6] 孔荣. 中国农户经营风险与借贷选择的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的案例[J]. 世界经济文汇, 2009(1): 70-79.
- [7] GUO X, ZHANG M. Study on functions of the agriculture cooperative in food safety[J].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Procedia, 2010(1): 477-482.
- [8] 杨天和,褚保金. “从农田到餐桌”食品安全全程控制技术体系研究[J]. 食品科学, 2005(3): 264-268.
- [9] 龚刚强. “矫正的正义”视角下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及其实施中的问题——以“三鹿事件”为例[J]. 朝阳法律评论, 2009(2): 50-62.
- [10] 陈卫平. 社区支持农业情境下生产者建立消费者食品信任的策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6): 48-60.
- [11] 华红娟,常向阳.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对农户食品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葡萄种植户的实证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6): 90-96.
- [12] 王瑜,应瑞瑶. 契约选择和生产者质量控制行为研究——基于农户风险偏好视角[J]. 经济问题, 2007(9): 85-87.
- [13] 赵安平,王大山,肖金科,等. 蔬菜价格时间序列的分解与分析——基于北京市 2002-2012 年数据[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1): 49-53.
- [14] [英]弗兰克·艾利思. 农民经济学: 农民家庭农业和农业发展[M]. 胡景北,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4.

- [15] [美]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 程立显, 刘建,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77.
- [16] 薛晓源, 刘国良. 全球风险世界: 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1): 44-55.
- [17] 崔德华.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D].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8: 1.
- [18] 邓万春. 关于农民市场风险的一种表述——市场“规则”与“场所”的关系逻辑[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3): 35-45.
- [19] [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18-61.
- [20] 刘仲翔. 论农民生活的医学化[J]. 江海学刊, 2010(3): 135-141.
- [21] 张谦. 各大市场封杀海南“毒豇豆”[J]. 农家致富, 2010(6): 11.
- [22] 乐章. 他们在担心什么: 风险与保障视角中的农民问题[J]. 农业经济问题, 2006(2): 26-35.
- [23] 徐慧清, 蔡淑燕. 农民风险意识与规避能力分析[J].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7(1): 13-15.
- [24] 刘建锋. 山东菜贱伤农事件调查[N]. 中国经济时报, 2011-04-25(06).
- [25] 郝建梅. 风险社会: 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D].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2009: 23.
- [26] 王道勇, 江立华. 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风险意识考察——以对皖南 S 村农民的访谈为例[J]. 学术界, 2005(4): 209-213.
- [27] 赵建欣, 张忠根. 农户安全蔬菜供给决策机制实证分析——基于河北省定州市、山东省寿光市和浙江省临海市菜农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09(05): 31-38.
- [28] HARWOOD J, HEIFNER R, COBLE K, et al. Managing risk in farming: concepts, research, and analysis[M]. Washington, DC: U. S. Dep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1999: 12-83.
- [29] 孙亚清. 风险、策略与制度演变路径: 农户视角[D].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05: 18.

The Risk Structure and Risk Distribution Mechanism for Vegetable Peasants under Food Crisis

——A Case Study from Shandong

YANG Rui-ling, ZUO T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Abstract The frequently-seen crisis on the unqualified vegetables and unacceptable low price of vegetables show that vegetable peasants are challenged by much more complex risks than other kinds of peasants. Based on the field study from a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found that vegetable peasants have been totally involved in the running of market mechanism. The main risks peasants suffer from consist of natural risks that can be dealt with flexibly, market risks that can bring significant loss and technical risks that are unperceivable but detrimental to society. Peasants tend to be sensitive to the natural risk, a risk classified into the traditional risk, yet hysteretic and biased to the modern risk, such as the market risk and technical risk. Moreover, risk perception gaps, modern labor division, dualistic market structures and the lack of formal risk coping mechanism bring high risks to vegetable peasants. To improve vegetable growers' capacity for coping with risks,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the building of peasants' knowledge system, supports to females and the old, the regulation of orders of rural markets,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s domestically, foster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 marke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ormal safety net.

Key words vegetable peasants; risk; risk position; market; food crisis

(责任编辑: 刘少雷)